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史料的挖掘与研究

王日根

(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创立和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独特的个性,表现在广辟社会史新的史料来源,凡土地契约文书、家谱族规、私人帐簿、书信、字书、辞书、碑刻、方言书乃至遗存的社会习俗等都加以留心,以补充正史史料的局限,从而对中国传统社会官民关系、阶级关系和传统社会变迁的新旧因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傅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取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体现了整体史的学术视野,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

关键词:傅衣凌; 社会史料; 解读

中图分类号: K0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395 (2010) 03 - 0001 - 06

收稿日期: 2010 - 02 - 17

作者简介:王日根(1964 -),男,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冯尔康先生说: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1]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面看,原始社会的氏族,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等级、阶级、阶层、宗族、家庭、民族、宗教都在社会史的视野之内。从物质与精神生活角度看,城乡、东西南北地区各不相同,衣食住行中的制度、变化与崇尚、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音乐、歌舞、戏剧、曲艺、杂技、体育、棋类、书画、牌类甚至还包括非正当的赌博、嫖妓等亦都在社会史的关注点上。总体而言,社会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因此,社会史的资料领域也必然涉及到史料的一切形式,不仅可以是正史,而且也可以是笔记野史乃至小说传说;不仅可以是文献的,而且也可以是田野的;不仅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或习俗式的,单单在社会史的史料的挖掘方面,我们就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研究工作。傅衣凌先生较早就在社会史史料的挖掘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理应加以总结和提升,或可给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一、广泛开辟社会史新的史料来源

人们常常为历史材料的真实性感到困惑,梁启超斥责二十四史为帝王家谱,不能反映中国的全史。即使作为帝王家谱,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篡改、隐匿和不实之处。傅衣凌先生当年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社会史讨论中回忆说:“在模糊之中,总觉得中国历史的发展虽没有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但不同于欧洲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外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理论有所反感,不同意人们所提出的外铄论。在长期的摸索中,我一面注意学习外国的社会经济史,资为比较;一面则广泛的搜集史料,作为立论的根据。最初我是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着手的,注意到明清时代的农民阶级斗争。引起我的极大兴趣的是明正统年间(1436 - 1449)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的起义,起义军高呼反对送租和冬牲的抗租口号……抗战开始,我从沿海城市来到福建永安农村,无意中发一大箱土地契约文书,达数百纸之多,自明嘉靖年间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有。其中有一张嘉靖年间的土地契约文书,还有缴纳冬牲的记载。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又促使我从事中国封建土地制

度的研究。永安的设置时间,是在镇压邓茂七起义之后。这件事唤起我的思考:虽然经过农民军的猛烈冲击,封建地主势力却依然强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照样牢固存在着。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此,不能简单地从土地制度本身去寻求解答,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诸因素,这样又把我的研究面扩大了,即从农村扩大到商业上来。”傅衣凌先生是由理论的思考走向实地的查访的,然后又从实地查访中,追寻社会事象的制度渊源,这就奠定了其研究的理论色彩和本土性。过去我们时常会夸大农民战争的作用,实际上地主势力并不一定就是被打击的对象。傅衣凌先生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别人一般研究较难提出的问题。

傅衣凌先生说:“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要拓宽对历史的认识,寻求尽量多的途径是必须的,在“死文字”之外关注“活材料”,既能加深对“死文字”的理解,又能进一步扩大社会史的视野,形成对

整体社会史的把握。把实地考察和史籍研究相结合,便成为傅先生坚持一生的研究取向。

傅衣凌先生曾不断从社会调查中得到意外收获,如1939年出版的《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是那年为躲避日机的轰炸,在距城十多里的黄历乡的一间老屋,无意间发现的。这是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嘉靖年间以迄民国,有数百张之多,其中有田契、租佃契约以及其他帐簿等等,随后傅先生即依据这些契约整理成三篇文章,编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傅先生在题记中充满自信,喜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他说:“我常想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能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还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民间记录的搜集。……商店帐簿、民间契约已为外国学者所重视。本书引用的资料大部分即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契约类辑而成,皆为外间所不经见的东西,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傅先生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日益形成了从社区着眼,关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以小见大”的研究风格。

《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文史哲》1983年第2期。
《文史哲》1983年第2期。

傅衣凌先生把契约、族谱、碑刻、帐簿、字书、辞典、方言书等都用作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从中寻求历史发展演进的脉络。跟随傅先生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做学生的都受到了极大的熏陶。1985年冬天,我曾经在惠安县文化馆拜访蔡永哲先生,花了约一周多的时间从他那儿为傅先生抄录了《惠安骆氏族谱》和一本地方辞书,我当时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傅先生需要这类书,慢慢思路开了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了“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韵味。在这里,傅先生的研究取向颇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介绍说:“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简言之,它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发现方法。”^[21]傅衣凌先生则提出:“历史是一门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来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22]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我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23]傅先生凭着自己的学术敏感,经常能“化腐朽为神奇”,从人们不经意的物件中寻出历史的脉络来,把过去干瘪的历史充实起来。

陈支平先生说:“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规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之所在。”

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归结起来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

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簿、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即使从今天看来,傅衣凌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

陈支平先生强调道: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歌民谣、传说杂抄、谱牒私册等资料面前,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别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资料来。因此,我们回到历史学的传统话语,历史学家做好社会调查工作,还是应当具备唐代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和史识。否则的话,社会调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使研究者沉溺于漫无头绪之中,从而失去了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

陈支平先生这里所批评的是史学界确实存在的一种偏向,似乎只要接触了实地,就可得到百分之百可信的东西,这种研究就一定有价值。并往往以自己的研究排斥别人的研究,这种为学的风气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有宽广的学术胸襟,提倡多种学术风格的并存,而不宜自言自语,固步自封。

陈支平先生还说:中国的传统史学极其注重对史料的辨析,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史学家们不仅要考辨史料的真伪,还要鉴识史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论从史出,只有在审慎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社会调查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者

《东南学术》1999年第6期。

对社会调查所得的资料不加辨别分析,就有可能听风就是雨,只见到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到一点东西就发一通宏观的议论,大大降低了社会调查资料作为历史资料的可信度。同时,从事社会调查所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应当极力避免先有了一个主观或主题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资料进行论证。这种作法就更加与史学研究“论从史出”的起码常识格格不入。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固然是本世纪中叶逐渐兴起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把社会调查资料运用于史学研究,有益于拓展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种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既需要在寻求新的史料来源方面取得突破,又需要结合当代学术发展脉络作出阐释。傅先生开辟新的史料资源是不设边界的,不断地追索历史中的疑点,不断寻求新的史料依据,应该成为我们开辟新的史料来源的落脚点和归属点。

二、对社会史资料的经济史诠释

(一)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官民关系的研究

傅衣凌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弹性论”,即官民之间往往可以在“道”和“德”等旗号下相互配合,通过民助官治,民纠官弊等形式使官民矛盾得以化解、消融,从而维持传统社会在某些时期、某些区域继续平稳地运行。正因为此,傅先生曾蒙受了左倾思潮的冲击,左倾思潮中较多人强调传统社会官民的不相容性,片面地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似乎不如此就无法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他们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每一个阶级都曾在其形成的初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也曾曾在一定阶段发挥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即使是在封建社会的王朝中期,地主阶级也可能实现自我的反思和纠偏。其实,傅先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而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个性,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在傅先生的研究中,传统社会的官民关系经常呈现出两面性。官方固然经常地把赋税负担施加到农民身上,但它也不能不考虑农民的承担能力,从农民角度看,科举制度对他们也是开放的,他们往往表现出对封建政权的臣服、对

主流价值观念的服膺以及沿着正常渠道走向社会上层的期望,在家族建设中,官民的界限就时常被模糊,相互的协调和合作就可以达成。在自然灾害面前,官民合作抗灾、救灾的事例更多。在地方公共事业的建设中,官民的配合也往往导致地方秩序的和谐。

过去我们较多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严厉的中央集权来维持的,傅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已揭示基层社会的稳定程度常常与地方家族建设、文化教育的发展、绅士豪民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也成为各地虽同属一个王朝,治乱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却可能大相径庭的原因。

(二)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

傅衣凌先生一直没有放弃研究乡族势力,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问题,提出了既有阶级对立,又有乡族结合;既有经济强制,又有超经济强制,身份制和经济权相互分离又抱合在一起等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状况的论断。正因为如此,傅先生被扣上“抹杀阶级斗争”的帽子。其实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也强调了在中国社会除了政权之外,还有族权、神权、夫权的影响,傅先生以自己大量丰富生动的民间史料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多种社会权力的影响,无疑是切实的,后来的历史学界、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研究也反复证实了傅先生论述的正确性。

社会生活中的事例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傅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实际上不仅呈现了阶级关系缓和的一面,而且也多揭示了阶级间斗争的残酷一面。譬如,在永安、在泉州佃农的抗租斗争时常发展到很尖锐的地步,譬如地主还时常侵犯佃农和佃农家属的人身权利,有些地方甚至盛行“初夜权”。或许只有关注到社会生活的更多侧面,我们才能对社会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

(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演进中新因素的充分估计。如山区的、沿海的、思想文化界的、社会风尚方面的等等进步因素,在傅先生的研究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也成为他质疑中国社会停滞论的重要表现。

傅衣凌先生从史料出发,认识到中国社会并不长期停滞,而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先是看到地主并不单纯依靠地租生活,还与市场相联系,既而又看到手工业中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

雇主与雇工间的直接经济关系、江南地区农业中企业化经营形式亦已出现。傅衣凌先生提出16、17世纪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且呈现出从山区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到粮食生产,各地存在鲜明的不平衡性,萌芽受阻、中断、夭折乃至倒退的现象都有,萌芽可能现于先进地区,也可能现于落后地区和闭塞地区。可以说,傅先生所用的资本主义萌芽概念是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进步因素的总括,充分显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之处,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本土性的认识。

傅先生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经常注意搜集人家所不注意的材料。傅先生回忆说:“记得抗战时我在永安的农村里,有一刘氏土堡,在他的厅堂墙壁上写有一条禁止族内所存在的收继婚的禁例,知道福建永安县也曾有收继婚的习俗,这便是一条很好的社会史资料,并曾函告时在中山大学研究中国婚姻史的董家遵先生。我在研究中国行会时,曾发现中国手工业帮会制的发展基地不仅在城市,而系从农村延长到城市去,且没有离开过它的原有基地,于是这就形成中国城市的工商阶级对封建地主的斗争性不大,反成为封建势力的拥护者,它不可能像欧洲的资产阶级一样很顺利的从城市的工商者递变出来的。像惠安乡村族工现象明显,在福州市郊后屿村有“牛福”的行会组合,形成了耕牛雇佣的划片经营。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并没有形成。傅先生立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因而揭示的理论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傅先生总结了传统社会的新因素,却又不至于夸大这些新因素的革命意义,而是认识到“死的拖住活的”、“早熟又不成熟”的社会状况,在中国社会演进中,存在着诸多前社会残余,如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残余,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新东西的事物往往也不会危及传统社会机制。这种对社会演进中新因素的把握至今已为学界普遍的共识。

利用民间史料,傅衣凌先生还研究了江南市民运动问题、海商活动形式等问题,也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素。应该说,社会史把视角落到社会之中,我们就能较为便利地把握到社会变迁的脉搏。

三、傅衣凌先生的研究特点及对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傅衣凌先生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特色,即:1. 社会史的取向;2.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3. 史料的整体把握,保证了历史认识的完整性;4. 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结合。我们并不认为傅先生这套做法能代替过去所有各种研究途径,但可以说,这套研究方法具有独到性和很强的解释和呈现民间社会历史的功能。

杨国桢说:“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的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即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有社会经济史的特色。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4]

傅衣凌先生本人说:“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帐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的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5]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舞台上,瞿宣颖、陈登原、尚秉和、冯尔康等先生注重从官书、正史、文集中搜集排比历史资料,解释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状况、婚姻生活、妇女生活、生产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资料的分类整理研究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又有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如费孝通、陈翰笙、李景汉、林耀华等的研究,亦把中国社会的研究推进到细微的阶段。他们各自的贡献都不容抹杀。当然,像民俗学界钟敬文、历史学界魏宏运、苑书义、乔志强等北方学者为新时期社会史的复新也建立了重要的功勋。而傅衣凌先生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各种官私文献典籍的收集和运用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进行的解读,这对20世纪及其后社会史学都产生了或还将产生着深刻影响。如今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已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傅衣凌先生的学生或积极致力于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或进一步有所拓展。如李伯重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开展了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杨国桢率其弟子王日根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开辟了海

洋社会经济史的新天地,陈支平、郑振满则继续在福建社会文化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出版了《台湾文献丛刊》《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卷 1册、泉州府卷 3册)等大规模的史料,为下一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资料基础。王日根还对重点反映江南区域社会史的明清小说开展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叶显恩、陈春声、刘志伟、钱杭、赵世瑜、梁洪生等先生也深受傅先生学术方法的影响,在徽州、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区域、江西山区、华北地区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壮大了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队伍的阵容。

傅先生认为: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没有别的法门,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轻浮自满,日积月累,做一个老

实的读书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较好的成绩。

历史学确实是一门深邃的学问,我们采用一种研究风格,或许是寻找到了—种解释历史的视角,但绝对不能认为历史研究只能有这—种视角。事实上,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提供给历史研究者以启示。

参考文献:

- [1] 冯尔康.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 [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2 - 3.
- [2]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M]. 杨豫,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55.
- [3] 傅衣凌.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33 - 44.
- [4] 杨国桢. 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术源流和研究方法 [J]. (台湾中坜)史汇, 1997 (2).
- [5] 傅衣凌. 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 [M]. 邵武:协和大学, 1944 (题记).

On Mr. Fu Yiling's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ical Data

WANG Ri - ge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r Fu Yiling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His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school is embodied in his collection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land contracts, pedigrees, clan rules, personal account books, letters, works of calligraphy, dictionaries, carved stone inscriptions, books in dialects, and even the still existing social customs, all of which are taken as supplements to the limited historical data. In this way he rightly 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ub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ies. Mr Fu sticks to Marx's materialism and his own academic orientation in historical studies. It is worthwhile for us to learn from his comprehensive academic viewpoint.

Key words: Fu yiling; historical data; interpretation